本文是余英时早年的一篇文字，酝酿于新亚书院时期，最终成稿于访学哈佛之际。本文篇幅较长，约有五万字左右，算是一中长篇的论文，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已可作为博士生的毕业论文。

先看本文的史料与基本的研究方法。汉代研究，最重要、最完善的史料仍是前三史（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），以及少数的时人文章（如荀悦），这些是“第一手”的资料（出土文献终究有限制，且其发现多靠运气，作者写作时自然没有参考出土文献的机会）。在本文的研究方法上，除却传统的论史结合外，作者多采用人物的列表分析，尽可能将所掌握的证据呈现给读者。

本文最要紧之结论，在于证实这样一种历史的趋势，在由西汉初至东汉初年，“士”的力量得到了显著的增强，且“士”与传统的宗族势力相结合，成为当时社会上据有主导地位的势力。王莽之新朝、更始帝与绿林军、赤眉军等皆是因未与士族大姓相协调而亡，光武帝则因积极与士族大姓相结合而兴。作者的论述从多个方面展开，包括两汉之际起兵群雄的背景分析、士族数量在西汉的激增、光武或王莽或更始集团与大姓之关系等，对本文所要阐述之题意“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”做了详尽之叙述。

然就士族与东汉政权之关系，以及士族与大族之关系，本文只是开了一个头，尚有待揭示、阐发之处。作者在结语中写道，“要想把士族与大姓截然分开，的确已很为困难”、“在这一阶段的历史进程中，不是士族跟着大姓走，而是大姓跟着士族走”，此当为不易之论。但本文毕竟是从“士族”的视角出发而写就的，若从“大姓”的问题展开，我们还可问：在与士族相紧密结合前后，大姓的影响力是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？如果说，西汉以来所形成之士族，是传统的宗族之上，浸染学术修养、学风与家风相融合而形成，则西汉以前之大姓该做如何之观察与解释？就笔者的一些简略但未必准确的印象来说，似乎春秋战国之所谓大姓，往往与封建之“大夫”紧密相联系，具有贵族性、世袭性之特征，而“士”则为下层新崛起之知识阶层，具有平民性、流动性之特征。“周秦之变”（此非秦晖所阐述之意义）或可视为一大转折关头，此时旧日六国之贵族已失去政治上险要之地位，而新兴之“士”尚未及巩固自身，固有作者所观察到的，西汉政权之建立与“士”之关系甚微。但我们也需注意观察如旧日六国贵族在秦汉之际的作用，如项羽等人，方有一较为全局性的视野。

东汉之建立既已仰赖士族之帮助，“自此以后东汉政权完全稳定。光武对于这些武装宗族采取了怀柔与分化并用的策略，直到完全摧毁了他们的力量才肯罢手”，然而实际上并未能够做到“完全摧毁”，不然作者也不必在结语中留下“：此一藉着上族大姓的辅助而建立起来的政权，最后还是因为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失去了协调而归于灭亡！”的慨叹。此或许为一种观察提供了证据，即由战国至秦再至汉之际，社会阶层之动荡远剧于两汉之际，在后一时期，尚能有更多之上层保持影响力，此或即与“士族与大姓的结合”有关，亦与此一时代变革之特征有关。